

2018年11月,《江南运河考据》一文在《中国水运报》发表,分“孤证不为实说”“通航标准不一”“敕穿江南河无必要”等方面对江南运河考据过程和“京杭大运河”名字的出处考据进行报道,稿件刊发后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和讨论。

为进一步阐述江南运河相关文化历史,此次笔者分别从文化经典、配套工程、水网建设、疑起及结论等方面再次论证隋炀帝“敕穿江南河”存疑的观点。

□ 何建春 张锦平

江南运河再考

唐宋诗词众多 无提及“敕穿江南河”

无论是在中国大运河史上,还是在江南经济社会发展中,江南运河都有着重要的地位。因为千百年来,江南运河不仅曾承担着南粮北运,北货南输的重任,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生命线,也直接便利了中国南北的水上交通,极大地促进了江南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。而且时至21世纪的今天,江南运河仍然是中国大运河中通航条件最好,航运最为繁忙的黄金水道,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。

过去,统治者成为唐宋诗词的重要题材,因此,有关描述与评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唐宋诗词至少在数百首(篇)以上。较早出现的是白居易的《隋堤柳》:“隋堤柳,岁久年深深衰朽。风飘絮兮雨萧萧,三株两株汴河口。老枝病叶愁杀人,曾经大业年中春。大业年中炀天子,种柳成行夹流水。西自黄河东至淮,绿阴一千三百里……”

随后,有李益的《汴河曲》:“汴水东流无限春,隋家宫阙已成尘。行人莫上长堤望,风起杨花愁杀人。”杜牧的《汴河怀古》:“锦缆龙舟隋炀帝,平台复道汉梁王。游人闲起前朝念,折柳孤吟断杀肠。”汪遵的《汴河》:“隋皇意欲泛龙舟,千里昆仑水别流。还待春风帆帆暖,柳阴相送到迷楼。”张栻的《隋堤怀古》:“隋季穷兵复浚川,自为猛虎可周旋。锦帆东去

不归日,汴水西来无尽年……”

直至晚唐时,仍有大量的诗人评说隋炀帝的开河。如皮日休的《汴河铭》:“隋之疏淇汴,凿太行,在隋之民,不胜其害也,在唐之民,不胜其利也……”

到了北宋时,又有石介的《汴渠》:“隋帝荒宴游,厚地剝为沟。万舸东南行,四海困横流……”梅尧臣的《汴渠》:“我实山野人,不识经济宜。闻歌汴渠劳,漫赋汴渠诗。汴水源本清,随分黄河枝……”黄庶的《汴河》:“汴都峨峨在平地,宋恃其德为金汤……万艘北来食京师,汴水遂作东南吭……”郑獬的《汴河》:“朝漕百舟金,暮漕百舟粟。一岁漕几舟,京师犹不足。此河百余年,此舟日往复。自从有河来,宜积万千屋……”

值得注意的是,这么多的唐宋诗词,几乎都集中在隋炀帝开凿运河渠(即汴水),但无一首诗词说到“敕穿江南河”。在《隋堤柳》中,白居易说得很明白:“大业年中炀天子,种柳成行夹流水。西自黄河东至淮,绿阴一千三百里。”即隋炀帝开凿的是西自黄河东至淮河一千三百里的通济渠,似乎与江南运河并无多大关系。有人在评说这些唐宋诗词时时常道:“写的是汴水,其实也指江南河”,这实在有点太牵强附会了。



运河湖州段。张锦国 摄

配套水运工程 隋代均为空白

大运河从南到北,水位落差很大。为此,先民们在开凿运河的同时往往修筑堰埭,壅水助运。

江南运河八百余里,地势两头高亢,中间低洼,水流、水势和落差各不相同,要保障河道水流和舟船通行,必须修筑堰埭壅水助运。为此,秦代开凿陵水道时修筑马塘堰。汉武帝时开通苏州至嘉兴之间的运渠时设置杉青堰。

纵观江南河沿线,堰埭不少,既有建于秦汉时期的马塘堰、杉青堰等,更多的是建于唐代的京口堰、虔亭堰、望亭堰、奔牛堰、长安堰等。

在支流塘浦上的堰埭就更多了,现嘉兴境内的杨家埭、钱家埭、张家埭、栖树埭、余贤埭等,相传都是唐及五代设堰埭而留传下来成为地名的。

唐及五代还在江南河上建有斗门,即单闸,也就是在陡坡急流处开挖泄流的明渠,衬砌成水槽,设置闸门,用以控制水流和航行。诗人李白的《题瓜洲新河饯族叔舍人贲》云“两桥对双阁,芳树有行列……海水落斗门,潮平见沙洲。”江南河上主要著名的斗门有:练湖斗门、嘉兴斗门、龙山闸、浙江闸等。

到晚唐,斗门已经相当普遍。白居易有诗云:“酒酣凭栏起四顾,七堰八门六十坊”。并且已经出现双闸门的斗门。《水部式》记载:“扬州扬子津斗门二所,宜于所管三府兵及轻疾内量差,分番守当,随便须开闭。”

正是这些堰埭斗门,丰富了江南河的水源,解决了因地势而造成水位落差等问题,保证了河道的水流和舟船的通行。然而,这么多的堰埭斗门,要么建于秦汉时期,要么建于唐及五代,唯独隋代修筑的是个空白,这也进一步表明隋大业六年并没有“敕穿”江南运河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塘路纤道的建设。秦代治陵水道,初创江南运河塘路。汉武帝开河百里,建造了苏州塘路。到唐代,江南运河塘路开始全线连通。这不仅改变了原河湖不分,一片汪洋的面貌,而且解决了挽牵、驳运和航行上的风涛之险。经过历代的修筑,江南河沿边的塘路纤道不断完善,以利漕船牵挽往返,在促进运河航运和漕运事业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。同样,隋代的塘路建设也是个空白。这也再次表明,隋大业六年“敕穿江南河”存疑。



江南水乡。

传说或推测 诸多问题有待探讨

那么,如何解释或解读《资治通鉴》中的隋大业六年“敕穿江南河”呢?

这部耗费了司马光毕生精力撰写的巨著,纵贯 1360 多年历史,采用追叙和终言等各种手法,以政治、军事的史实兼及经济、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等,展示历代君臣治乱、成败、安危之迹,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、民族兴亡的政策描述警示后人。

司马光为了充分展示隋炀帝好大喜功、穷奢极欲和荒淫无道以及他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及痛苦,自然要有所渲染,于是将隋炀帝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一番。秦始皇,一统六国,筑万里长城,修驰道,北征匈奴,南伐百越。隋炀帝则营建东都,凿南北运河,科举取士,巡视西域,三征高丽。秦始皇会上稽,祭大禹,《史记》云:“始皇出游……浮江下,过丹阳,至钱唐。临浙江,水波恶……会上稽,祭大禹”。隋炀帝也得有,于是《资治通鉴》写下了,“敕穿江南运河……使可通龙舟,并置驿官、草顿,欲东巡会稽”。可见,“敕穿江南运河”“欲东巡会稽”只是传说或者推测。

为编撰《资治通鉴》,司马光收集汇集了大量的资料,其中不乏各种传说,要对 1360 多年的史料,包括传说,以他事事躬亲,全部进行核实准确似乎难以做到。更何况,隋炀帝确实大兴土木,开凿了通济渠、永济渠等大量运河水道。而随着通济渠和邗沟的开通与疏浚,江南运河也确实需要贯通、拓宽、加深。

相比《北史》《隋书》等,《资治通鉴》增补了两段有关隋代运河的记述:大业元年“又发淮南民十数万开邗沟,自山阳至扬子入江。渠广四十步,渠旁皆筑御道,树以柳;自长安至江都,置离宫四十余所。”以及“敕穿江南运河,自京口至余杭,八百余里,广十余丈,使可通龙舟,并置驿官、草顿,欲东巡会稽。”然而,这两段记述均遭到了质疑。其中开邗沟,清人刘文淇在《扬州水道记》中说:“大业所开邗沟,系开山阳渎又开广之。”近

人朱偃在《中国运河史料选辑》中也说:“《通鉴》则于通济渠外,又言开邗沟,实则邗沟即山阳渎,早在开皇七年开通,疑《通鉴》有误。”所以,所谓“开邗沟”实际上只是对山阳渎进行拓宽、加深。

“敕穿江南运河”也一样,司马光用的是“敕穿江南运河”,而不是“开山阳渎”“开通济渠”和“开永济渠”,并且写在当年的最后,既没有像开山阳渎、开通济渠和永济渠那样标明兴工的月份,更没有说明组织动员的民工人数,有含糊其词之嫌。而从字面上理解,“敕”为皇帝的命令,“穿”为贯通。也就是说皇帝下令要贯通江南运河,其只是疏通的意味十分明显。而当时的江南运河确实亟须贯通、拓宽和加深。于是,隋炀帝“敕穿江南河”,即下令要贯通江南运河,便也在情理之中,可惜他没能来得及或者说顾不上做。

通过考证,可以看到,隋炀帝开凿通济渠、永济渠等南北大运河的历史功绩必须充分肯定,但也不能单凭一个孤证,便言词凿凿地肯定是大业年间“敕穿”的江南运河。江南运河的历史等诸多问题都值得探讨与商榷。

此外,江南运河的全线贯通并非隋大业年间的“敕穿”一蹴而就的,也没有进行过类似“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,开通济渠”这样的大规模施工,而是先人们经过从唐至五代数百年持续不断的努力才全线贯通、不断完善的。

江南运河是一个系统工程,并非只是隋大业年间“敕穿”的一条河道,而是由塘路斗门以及塘路纤道等一系列配套设施组成的系统工程,并且主要是在唐及五代开始建设、完善的。

江南运河自古,至少在 1000 多年前的五代时,便已是一个完整的河网体系,兼有灌溉、引排、水运等诸多功能,虽然其河道航线多有变迁,但任何时期的任何河段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,将某个时期航道的变迁说成“篡改”,是要不得的地方狭隘偏见。(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)



俯瞰运河。张锦国 摄

钱鏐治水 构建江南运河网体系

江南运河唐代全线畅通后,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,不仅通航条件全面完善,而且结合水土开发,治水营田,构建起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。

五代时,吴杨及南唐割据江淮,南北对抗,战乱不已,南北运河航运基本陷于停顿,直至后周,才开始出现转机。而江南运河,由于以杭州为都建立政权的吴越国,偏安于东南一隅,“富埒御敌”,仍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当时,江南运河的更大发展在于紧密结合水土开发,治水营田,大规模地进行拓浚和整治,在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及屯田的同时,构建起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。

吴越钱氏立国后,围绕着进一步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及其屯田,大规模地拓浚与浚治河道。钱鏐不仅设立开江营和都水使者,专业拓浚港浦,还组织撩浅军,专职进行河道疏浚,就连军队的主力八都兵和勇武都等也都时常承担河道的拓浚等施工。为此,还曾引发了武勇都将徐德裕的叛乱。

令人瞩目的是钱鏐无论是对发展塘浦圩田系统和屯田,还是拓浚与浚治河道,都从整个江南地区着眼,并将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一起,全面规划、周密布局、高端设计。塘浦圩田系统和屯田采取“浚三江,治低田”“蓄雨泽,治高田”的方法,旱涝兼顾,高低分治。纵浦横

塘之间,利用开挖土方,筑堤作圩,构成位相承,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。

同时,依据棋盘式的塘浦圩田系统浚挖河道,不仅进一步拓浚了杭州塘、苏州塘以及东苕溪、荻塘等主干道,开凿了澜溪塘等水道;据《嘉兴市志》记载,澜溪塘,五代吴越开,古时,“两岸俱栽枫树”,红叶烂漫,因而得名,而且还深浚河浦,干支并举,拓浚、疏通了大量的支流港浦,使纵横塘浦,交织成网,塘浦深阔,行水通畅,构建起纵横交错的河网。

由此,江南运河由原来线状的河道发展成为由杭州塘、苏州塘、东苕溪和澜溪塘等为主干,上百条支流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,不仅四通八达,航行通畅,而且成为容量巨大的平原水库,为促进江南经济繁荣、社会发展,发挥了更加重要作用。

虽然江南的塘浦圩田系统到北宋时就大部分解体,但江南运河网的基本格局则始终未变,直到 21 世纪,才进一步发展成为以京杭运河、杭申线、杭(杭州)湖(湖州)锡(无锡)线、六平申线及苏(苏州)嘉(嘉兴)乍(乍浦)线纵穿南北,长湖申线、湖嘉申线、杭甬线横贯东西的五纵三横的现代运河航道网。所以,江南运河由单纯的线状河道发展成为纵横交错、四通八达的河网体系,不能不说功在钱鏐。



中国大运河遗产点。

唐宋传奇精典 考证隋炀帝拓浚运河

文学是时代的镜子,隋炀帝大业年间开凿大运河,是隋代举世瞩目的大事,必然反映到文学中,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记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传奇《炀帝开河记》。

《炀帝开河记》以真实事件的叙述和虚构情节的设置,描述了隋王朝的腐朽和当时风气的败坏。隋炀帝为了乘船游江南,竟不惜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开掘运河,劳民伤财,损失巨大。而麻叔谋一类的官员,则乘机徇私舞弊,贪赃枉法,对国家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,并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。

此文最早著录于南宋尤袤《遂初堂书目》,杂史类,题作“炀帝开河记”;《宋史·艺文志三》入地理类,题同,一卷,注“不知作者”,原文载于明初陶宗仪《说郛》原本卷四十四,题同,一卷,不著撰人。又见于明陆楫《古今说海》卷一百二十二说篡部逸事家、明李斌《历代小史》,也题作“炀帝开河记”,一卷,不著撰人。明吴瑄《古今逸史》逸记、重编《说郛》卷一百一十、《五朝小说·唐人百家小说》记载家所收均题作“开河记”,一卷,仍不详撰人;《唐人说荟》六集、《唐代丛书》卷八、《无一斋丛钞》、《旧小说》乙集皆题唐韩偓撰,

未知何据。此篇传奇的作者,有唐末人和宋人两说,前说似更具说服力。

另外,还有两篇传奇,即《炀帝海山记》二卷和《炀帝迷楼记》一卷,前文叙炀帝即位、诏辟西苑、起十六院、梦陈后主、天象变异、王义上书自刎、炀帝遇害身死等事,后文则叙炀帝晚年沉迷女色荒淫之事,它们与《开河记》各题炀帝一事,互不重复又各有关联,当出自同一撰人。这三部唐传奇同样也无一字提到隋炀帝开凿或“敕穿江南河”。

大业元年三月,隋炀帝“发河南诸郡男女七百万开通济渠”,一千三百里,不足半年竣工,堪称奇迹,也过度地消耗了民力。大业四年,隋炀帝“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,引沁水,南达于河,北通涿郡。自是以丁男不供,始以妇人从役”,惹得民怨沸腾,从史书到诗词传奇都众说纷纷。而大业六年十二月,一个月“敕穿江南河,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,广十余丈”,如此再三地大规模动用民力,只怕民怨与舆论会更汹涌。而让此事存疑的是,关于演绎和渲染的传奇却不曾记叙,甚至无人说起,因此隋炀帝有没有大规模的开凿或拓浚江南运河仍有待考证。



宏村。